



记忆 篇

杨新华 / 浮泥王墓万古流芳

佩义兰·卡里姆 / 从考古遗迹看文莱—中国友好关系

徐宛芝 / 杨新华：中文文化交往的友好使者

黄溪连 / 不接触就无法恋爱——中文关系以及我与文莱的情缘

佩欣·贾米尔 / 在中国的11天——一段短暂却有意义的经历

潘正秀 / 我与文莱王后零距离接触

孙辰 / 南京：中文友好历史交汇的见证

淳泥王墓万古流芳

杨新华

(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

中国与文莱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梁代(502—557)。文莱二世苏丹麻那惹加那乃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率150余人来华进行友好访问,不幸病故于南京,明成祖朱棣以王礼将其安葬在南京南郊石子岗。这座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国王陵墓,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与其他国家友好交往的有力例证。

淳泥王墓的发现

1958年4月,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同年5月12日,普查人员来到东向花村,在田头向农民宣传文物普查的意义、目的和普查对象,并向他们展示贴有各种类型文物照片的相簿。农民们纷纷反映:乌龟山有个石乌龟,下山喝水,头给雷公菩萨打断,爬不回去了,现在还趴在山坡上……普查人员按他们指点的路线,循山中小径,登上乌龟山,发现了匍匐在山阳的龟趺。龟趺旁边的草丛中卧有一段残碑,碑文已大部分漫漶,但经过仔细揣摩,依稀可辨认出“葬王于安德门外之石子岗”“器皿及金银锦绮钱币甚厚赐王妻”“淳泥国王去中国”等字迹。当时,普查人员虽然怀疑这就是淳泥国王墓,但尚不敢下断言。

回到市文保会,普查人员查阅有关资料,在《皇明文衡》卷八十一中发现了明代胡广撰写的《淳泥国恭顺王墓碑碑

文》，遂将抄录的残碑碑文进行核对，内容完全一致。至此，终于查清了100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渺不可寻”的淳泥国王墓，便是这座被当地群众呼为“马回回坟”的“佚名”墓。随后，普查人员又在墓前的水沟里发现了另一段残碑。这是神道碑的上半段，字迹大都模糊不清，但开头的“……乐六年……月乙未淳泥王麻那惹……”等十数个字尚可辨识。

淳泥国王墓的所在地东向花村乌龟山，距明代南京城的聚宝门（今中华门）约五公里，距雨花台风景区四公里。这里是聚宝山的一部分。早在东吴时代（222—265），人们便称这一带为“石子岗”了，因为这里出产的雨花石色彩斑斓，晶莹剔透，如玛瑙宝石一般，人们又称这里为“聚宝山”“玛瑙岗”。聚宝山有三个主峰，位于东面的称东岗，又名梅岗，附近有江南第二泉、南宋抗金英雄杨邦义剖心处、明文学博士方孝孺墓、明宁河王邓愈墓、明福清公主墓、明镇国将军李杰墓、明虢国公俞通海墓、明西宁侯宋晟墓等名胜古迹；中间的称中岗，为雨花台死难烈士纪念碑所在地；西面的称西岗，又名菊花台。从习惯上，人们把东、中岗合称为“雨花台”，而安德门外的西岗则被直呼为“石子岗”了。

石子岗是六朝以来南京地区墓葬的主要集中地。清代陈文述有诗吟“石子岗”曰：“白杨萧萧江草暮，石子岗前六朝路；我来不见六朝人，惟见六朝丛葬处。”以淳泥国王墓为中心，北端约三华里处为六朝古墓葬群；其西南约一华里处有明代“传南山正宗第十三世、古林堂上开山第一代”的佛教中兴律祖古心大和尚及其弟子的墓塔，称天隆寺塔林；西侧约三华里处有明镇远侯顾兴祖墓；正南为尹西村，村侧碑亭山上有明南京户部尚书周金墓。石子岗古墓葬群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明成祖朱棣以王礼将淳泥国王安葬于此，其意

义非同一般。

淳泥王墓的维修

一度湮失百余年之久的淳泥国王墓，从发现的那一天起，中国政府就非常重视和关心。淳泥国王墓现在是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国家法律保护。政府委派江苏省、南京市和雨花台区的文物管理部门，负责淳泥国王墓的日常管理和保护工作。当地的铁心桥镇政府也安排专人负责环境卫生、每日巡查等工作。

50多年来，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墓园进行过七次较大规模的保护维修。第一次是在发现的当年，也就是1958年的8月，首先清理杂草，找出墓的神道，对残损的石刻进行扶正、修补。在这一次墓园清理的过程中，新发现了许多原墓的建筑材料，如享殿柱础、华表柱础等，还发现了一段用明代城砖铺砌的神道路面。接下来的几次维修，重点在绿化、道路、神道、神道石刻修补等。进入90年代以来，为迎接文莱外交部长和其他官员来访，市文物部门新铺了从神道碑到墓前的青石板路，雨花台区政府投资30多万元，新修了从大路到墓前的柏油路。

应该说，对淳泥国王墓的保护早已纳入了政府的日常工作范畴。此后，进一步规划、完善淳泥国王墓的整体开发利用工作逐步展开。雨花台区政府在“圈地建园，美化环境，整体规划，全面建设”时，突出强调“重点整修、建设墓冢和墓园内配套设施”，按照伊斯兰教墓葬风俗，对现有墓冢进行全面改造建设，并在墓园内建部分具有伊斯兰建筑特色的亭台、长廊，营造小型人工湖面，建设一座小型陈列



维修后的淳泥王墓

馆，以实物和图片资料宣传介绍中文两国交往史，建成集文物保护和文莱风格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外国国王陵园，供世人瞻仰。

2001年10月，淳泥国王墓提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雨花台区政府以此为契机，翻阅大量史料，科学规划了以修缮、维护淳泥国王墓为主的文莱风情园建设构想，旋于2002年秋斥资1000余万元，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维护、文物复建和环境整治一期工程，复建了牌坊、神道碑亭、墓冢、祭台，整修了神道，新建了“中国—文莱友谊馆”，树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绿化美化。历经两年建设，整个墓园更显庄严肃穆。600多年前安葬在南京郊外的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如若在天有灵，定会含笑于九泉！



通向淳泥王墓的墓道
大门

淳泥王墓的价值

1994年10月初，文莱历史中心主任、苏丹陛下文化高级顾问佩欣·贾米尔首次应邀来宁参观考察淳泥国王墓和郑和墓。参观期间，佩欣·贾米尔说：关于淳泥国王和这个墓，文莱国内的意见还不一致。有人说，墓主人不是国王；有人说，这墓是假的；也有人说，这个墓碑是中国人后造的，骗骗文莱人。还有一种谬论更令人哭笑不得，那就是文莱国王是被中国皇帝毒死而不是病死的，要不然，你拿出当时的病历和药单来看看。针对以上说法，笔者和专家学者等人以书中史料和碑文内容为依据作了有力驳斥。佩欣·贾米尔也非常明确地表示：“这是西方人散布的谣言，中国和文莱建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他们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日益密切的关系感到忧虑，于是，就

出现了谣言。”虽然这些谬论和谣言不堪一击，但对于许多不明真相的人来说，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不良影响。

佩欣·贾米尔回国以后，根据在南京考察时得出的结论，对照大量史书、口碑、石碑，进一步论证，最终以自己的威望、资历和渊博的知识改写了历史，改写了教科书，确认了病逝于中国的麻那惹加那乃是文莱 1402 年至 1408 年在位的第二世苏丹，填补了文莱苏丹系谱上的一个空白。他还从一个公墓中发现的墓碑碑文推断：文莱的第一位苏丹于 1363 年到 1402 年在位，他可能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在 1402 年他父亲去世后继承了文莱苏丹王位。“很自然，一个新的统治者要寻求对其承袭王位的确认，表明其并非出自某种强权。1403 年，文莱是爪哇的一个属国，所以这位新国王积极寻找中国的庇护，以摆脱对爪哇的依赖。尽管他死于中国，但目的已经达到，文莱作为中国属国的地位得到了确认。”

淳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在中国病逝后，永乐皇帝命其四岁之子遐旺承袭王位。回到文莱后，年仅四岁的遐旺不胜重任，“令其叔父以苏丹艾哈迈德（Ahmad）的名义执掌文莱政权”。永乐十年（1412 年）八月，遐旺和母亲一起又来到中国，一直到第二年二月才返回文莱。以后的史料中便再没有提及遐旺，估计他是早年夭折了。所以，他的叔父就一直继续统治着文莱，年限自然是从 1408 年开始，直到 1425 年去世。遐旺的叔父艾哈迈德在文莱被称为第三世苏丹。文莱学者利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口碑传说，连接了苏丹世系的缺环，其意义非同小可。

1991 年 9 月 30 日，中国与文莱达鲁萨兰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文莱玛斯娜公主等王室成员，外交、文化等部长和政府官员纷纷来华访问考察，其中不少专程前往南京拜谒淳泥国



王麻那惹加那乃陵墓，均对其历经 600 多年沧桑而保存完好深感欣慰和感激。玛斯娜公主曾深有感慨地说：“古老的中国人对不同客人都能放开怀抱，正是这种开放的态度，点燃了我的先辈们的想象力，让他们不畏艰难去寻找蕴藏在那遥远陆地上的知识……这座墓的历史也是两国友谊的见证。”

1998 年 10 月，参加
浣泥国王逝世 590 周
周年纪念活动的中文两
国官员在浣泥国王墓
前合影留念。

从考古遗迹看文莱—中国友好关系

佩义兰·卡里姆博士

(文莱文物局前局长)

苏莹莹 梁 燕 译

文莱和中国于 1991 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然而，两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可追溯到 1500 多年前。中国史料记载两国之间的往来始于公元 6 世纪，一直持续到公元 17、18 世纪。随着中国的朝代更迭，文莱在中国史籍中的名称也有所不同，如婆罗、婆利、浞泥、文莱等。

公元 10 世纪，文莱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浞泥”这一地名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史料之中。据记载，文莱曾派遣三名使者带着象征两国友好关系的贡品于公元 977 年前往中国。文中两国的关系持续友好，使者往来频繁。文莱曾在公元 1082 年、1370 年、1405 年、1408 年、1410 年、1412 年、1415 年和 1425 年派遣使者到访中国；而中国使者也于公元 1370 年、1405 年、1408 年和 1411 年出使文莱。互派使臣既显示了两国关系的密切，也体现了双方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相互重视。

除了官方往来，文莱与中国也建立了密切的贸易关系。在这方面，双方可谓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关系。文莱是一个盛产木材与自然资源的国家，其产品在中国、印度、中东等国外市场广受欢迎。文莱的主要商品有樟脑、白胡椒、藤木、西米、檀香木、沉香、蜂窝、燕窝、玳瑁以及龟壳。中国也有大量的商品出口到文莱，主要有瓷器、丝绸、铜、铁等。文莱与中国

之间的贸易关系日趋稳固，一直持续到公元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

在文莱，保存至今的一些考古遗址见证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本文主要论述这些历史遗迹中的其中一项，即公元 12—17 世纪的中国瓷器。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出土了大量中国瓷器的特鲁桑古邦（Terusan Kupang）遗址以及哥打巴都（Kota Batu）遗址。这两大遗址所出土的瓷器的生产时间有所不同，特鲁桑古邦遗址出土的是公元 12—13 世纪的宋朝瓷器，而哥打巴都遗址出土的是公元 14—17 世纪的明朝瓷器。本文也将对文莱境内发现的第一艘也是唯一的一艘沉船——“文莱沉船”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对沉船的研究来了解古代文莱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公元 15—16 世纪文莱与中国及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文莱境内出土的中国瓷器

瓷器是文莱境内大量出土的一种重要考古文物。与其他木制、布制或纸制的文物相比，瓷器具有可长久保存、不易变质、不易损坏的优点。基于此，瓷器为研究文莱当地的历史，特别是其贸易与对外关系的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早在约 8000 多年前就开始生产瓷器，是世界上最早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隋末唐初的瓷器生产凸显了中国在瓷器制造领域的辉煌成就。当时的瓷器是在 1300—1400℃ 的高温下烧制而成的一种高品质的瓷器。它质地坚硬，表面光滑，透光性好，并能防水。这些特点使得中国瓷器享誉世界，为其他国家所争相效仿。公元 10 世纪，中国开始对外出口瓷器，并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欢迎。中国瓷器的涌入使得文莱、菲律宾

文莱河畔出土的宋代
韩瓶



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瓷器制造业受到冲击并日渐式微。而在泰国、越南等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瓷器的进口却促进了当地的瓷器制造业向更高水平发展。

虽然据史料记载文莱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始于公元 6 世纪，但是在文莱境内尚未发现那个时期的中国瓷器。当时中国实行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东南亚地区和中国贸易全部掌握在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手中。因此，中国的商品很少出现在包括文莱在内的东南亚地区。到了唐朝，中国开始转变政策，朝贡贸易开始兴起。贸易因此受到重视，大量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开展贸易。外国的货物第一次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中国的商品也开始对外出口。开明的对外政策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发展，这其中也包括瓷器制造业。瓷器制造业开始显现出令人鼓舞的发展与提高。瓷器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这标志着中国瓷器走向外销的新时代的到来。瓷器在当时主要有以下用途：一是被当作礼品赠予外国的权贵，二是用于支付外国贸易港口

的通关税，三是作为等价物代替货币交换外国商品。

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在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持续发展，统治者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不仅外国商人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中国本土的商人也参与其中。公元 13 世纪中期，中国对外贸易水平日益提高，并完全由中国商人掌控。随后的元朝和明朝也继续实行开放的贸易政策。明朝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随着公元 1405—1433 年郑和下西洋而走向鼎盛。

开放的对外贸易给中国的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瓷器工业不断发展，并经历了突飞猛进的变化。产品的品质和数量都得到了提高，瓷器的流通范围也更为广泛，不仅仅在东南亚地区，而且远销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等地。因而，在文莱境内的各个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其中以特鲁桑古邦遗址和哥打巴都遗址最为突出。

特鲁桑古邦遗址

特鲁桑古邦是文莱境内的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据估计，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 10—13 世纪。它距离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约 5 公里。特鲁桑古邦是公元 10—13 世纪的一处重要居住地，而在随后的公元 14 世纪至 17 世纪，哥打巴都逐渐崛起。

1974 年，特鲁桑古邦开始引起文莱文化青年体育部博物馆司考古处的关注，因为此地出土的几块外国瓷器碎片被送往该部门进行研究。而对特鲁桑古邦遗址的文物采集和保护工作于同年展开。截至 1977 年，此处出土的外国瓷器和当地黏土陶瓷碎片已达数万件。在 1977 年末至 1978 年初进行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在三个挖掘区域中成功提取了 2329 件瓷器碎片，其中大部分为产于公元 12—13 世纪的中国宋朝瓷器，还

有少部分中国明清瓷器以及公元15—19世纪生产的欧洲瓷器。

1995年，仅两个工作日的时间，考古人员就从特鲁桑古邦遗址中采集了1364件瓷器文物，其中1306件外国瓷器、58件文莱本土瓷器。在此次出土的外国瓷器中，约95%是公元12—13世纪生产的中国瓷器，剩余的则是14—17世纪生产的中国瓷器和19世纪生产的欧洲瓷器。1999年10月13日至23日，考古人员再次对特鲁桑古邦遗址进行了发掘，共采集了3035件瓷器碎片，其中中国宋朝的瓷器共2648件，占总数的87.25%；其余的一小部分为中国元朝和清朝生产的瓷器。这些出土的瓷器主要是青瓷、白瓷、青白瓷、灰白瓷、绿瓷、黑瓷、金属釉瓷器。

特鲁桑古邦遗址中出土了公元12—13世纪的中国瓷器。这是文莱境内出土时间最早的中国瓷器。这一发现清楚地显示了文莱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确立。根据公元1226年赵汝适的记载，许多商人前往文莱用金、银、丝绸、玻璃、串珠、锡、铅块、象牙镯、木制碗盘、青瓷等商品交换当地的产品。其中记载的青瓷是指表面呈绿色或淡绿色的陶瓷，如青瓷、龙泉瓷、越窑瓷以及涂有绿色釉质的瓷器等。这些类型的青瓷在特鲁桑古邦遗址中大量出土，其中大多产自公元12—13世纪的中国宋朝。本文将主要讨论其中的三种，即越窑瓷、青瓷和龙泉瓷。

1. 越窑瓷

越窑瓷是特鲁桑古邦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大的一种瓷器。越窑瓷主要产于浙江越州窑。中国的其他地区，如广东和福建也产越窑瓷。在越州，有20多座瓷窑生产这种瓷器，其中上林湖窑和滨湖窑是两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其产品质量上乘。而在

广东和福建地区，生产越窑瓷的窑口主要有公元10—12世纪的广东西村窑、笔架山潮州窑和唐末宋初的广东笔架山窑、福建同安窑及熙春山窑等。在这些窑口中，同安窑与文莱境内出土的越窑瓷关系最为密切。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在于颜色，都是釉色绿中泛黄，并都用刻花或划花的装饰技法。

越窑瓷制品品种繁多、形状各异，如碗、碟、盘、花盆等。越窑瓷内壁常以刻花、划花及锥刺等手法做出以植物、云彩、鸟等自然之物为主题的纹饰，间以篦齿状工具锥刺出的篦纹，其形状多为波浪、云彩、线条等。越窑瓷的颜色也是多种多样，如青黄色、青灰色、灰白色、玉色等。

2. 青瓷

特鲁桑古邦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青瓷。青瓷的制造始于北宋时期，南宋时期其制作工艺得以提高。与越窑瓷相比，青瓷制作精良，达到了瓷器制作的巅峰，超越了在此之前出现的各类瓷器。因此，青瓷不仅在中国市场上大受欢迎，在包括文



从文莱深海中打捞上来的陶罐

莱在内的国外市场上也十分畅销。

青瓷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它经精工细作而成的富有魅力的青色色泽以及坚固细腻的质地，品类繁多的制品。青瓷制品主要有大小各异的碗、碟、盘、花盆等。青瓷的主产地为浙江、广东和福建。其中两个重要的青瓷窑口是广东笔架山窑和福建熙春山窑。福建的同安窑、南安窑、泉州窑、厦门窑、德化窑以及浙江武义窑等窑口也都出产青瓷。青瓷颜色多样，有青灰色、青白色、黄绿色等。

3. 龙泉瓷

特鲁桑古邦遗址中也出土了大量的龙泉瓷，其生产时间约为公元12—13世纪。龙泉瓷创烧于公元1080年，当时中国正处于北宋时期。龙泉瓷的制作工艺在南宋时期得到提高。元朝时，龙泉瓷继续出产，但这一时期的生产重点集中于针对国外市场的、尺寸较大的瓷器。明朝时期生产的龙泉瓷品质开始下滑，并且受到了青花瓷的巨大冲击（青花瓷是一种自明朝开始进入鼎盛发展期的瓷器）。

龙泉瓷质量上乘，胎质细腻，纹理优美，釉彩浓厚饱满，透光性好，色泽晶莹，温润如玉。龙泉瓷拥有变化多样的青色，如青灰色、青蓝色、橙青色、青粉色、苹果绿以及橄榄绿等颜色。龙泉瓷的特点是底足处呈赭红色，这是由于烧制过程中氧化物的作用使没有上釉的地方呈现红颜色。龙泉瓷质地坚硬，因为它是在1180—1280℃的高温下烧制而成的。其制品主要有圆锥形的碗、浅口平盘，尺寸较大的碗、盘子，搁置东西的三脚架、封口瓶以及花盆等。龙泉瓷制品大多没有雕刻花纹，即使有，通常也是在瓷器中部采用压制的技法刻有对鱼或花卉等装饰图案。另外，印花技法也应用于龙泉瓷的花纹制作之中，

较为常见的图案是莲花和鱼。

龙泉瓷主要产于中国南方，如福建。福建同安窑是龙泉瓷的产地之一，此处生产的龙泉瓷，其颜色多为淡绿色、橙青色、青粉色以及青灰色，图案多是采用压制技法制作而成的对鱼和花卉图案。同安窑生产的龙泉瓷与在特鲁桑古邦遗址出土的龙泉瓷有着许多相同的特点。由此可以推断，此处出土的龙泉瓷很有可能是从同安地区出口到文莱的。

哥打巴都遗址

哥打巴都是文莱重要的考古遗址之一，位于文莱河畔，距离文莱湾约 3 公里，距离首都斯里巴加湾也不过 5 公里左右。公元 14—17 世纪，哥打巴都曾是文莱的首都。同时，它也是东南亚地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是外商云集之地，这其中包括许多中国商人。

哥打巴都占地 120 英亩。它被划分为 3 个主体区域：山地、丘陵和河畔平原。丘陵区域和河畔平原是当地人主要的居住区，而山地就鲜有人居住了。丘陵地区是王公贵族的居住区；河畔平原则是平民百姓安家落户的地方，同时也是市中心。公元 1521 年，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其航海日志中记述了文莱的概貌：“整个文莱城建于水上，除了皇宫和达官贵人的居所。其人口大约 2500 户。木制房屋拥有高脚柱，使其可以立于水中。每逢涨潮时分，文莱女子就会使用小船作为交通工具，挨家挨户地贩卖她们的商品。”

作为商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哥打巴都不仅成为当地人的聚居地，也吸引着各国商人齐聚此地，以便通商和贸易。商人们来此一方面是为了购买当地的货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当地

市场销售自己的商品。公元 15、16 世纪是哥打巴都的辉煌时期。当时，它是东南亚重要的商贸中心和伊斯兰教传播中心。1511 年马六甲被葡萄牙人占领后，哥打巴都的地位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大批来自马来群岛、东南亚和中国的商人来此经商。在西班牙人 1578 年的记载中，哥打巴都是一个拥有多元民族居民的全球性的港口城市，其中包括中国人、交趾支那人（越南人）、暹罗人、北大年人、彭亨人、爪哇人、苏门答腊人、亚齐人、马鲁古人、苏拉威西人和棉兰老岛人（菲律宾人）。

公元 15、16 世纪，名扬万里的文莱获得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认可。通过公元 1405—1425 年间的互派使节和相互往来，中文两国的友好关系日益密切。与 10—13 世纪特鲁桑古邦作为商业中心时不同，这一时期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发展得更加迅速。当时，商贸对于文莱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外国商人特别是中国商人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使中国的商品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哥打巴都及其附近地区。中国商人对于将当地商品贩卖到其他地区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外国商人尤其是中国商人带来的商品中，瓷器占了绝大部分。哥打巴都地区的瓷器同特鲁桑古邦地区的瓷器有着明显的不同，尤其是在色泽和雕刻的花纹方面。在这些瓷器中，最著名的要属青花瓷，这种瓷器盛产于元代，在明代工艺不断提高。在讨论“文莱沉船”之前，本文将略微对青花瓷作一些介绍。

“文莱沉船”和哥打巴都遗址以及中文两国商贸关系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哥打巴都的中国瓷器

瓷器是哥打巴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瓷器是哥打巴都遗